

嘉道之际

扬州常州区域文化比较研究

◎ 徐立望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嘉道之际扬州常州区域 文化比较研究

徐立望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嘉道之际扬州常州区域文化比较研究 / 徐立望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308-05459-1

I. 嘉… II. 徐… III. 比较文化—扬州市、常州市—
清前期 IV. G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0141 号

嘉道之际扬州常州区域文化比较研究

徐立望 著

责任编辑 钟仲南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459-1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序

徐立望的这部《嘉道之际扬州常州区域文化比较研究》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他于1999至2002年攻读博士学位,由我指导。在讨论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本想建议他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或其他地方档案馆去查阅档案,以档案为支撑来写一个事件或一种制度,这比较容易成功,虽然看档案费些时间。但是他自己提出,他只是对传统文化学术有兴趣,并且具体提出写常州文化。我虽然同意了,却有些担心,因为这个题目的难度比较大。

第一,时间范围划定在嘉庆、道光之际。而这一阶段的清史研究是最为薄弱的,学术史的研究略好一些,但也仅是对个别文化人、学者如焦循、阮元、王引之、刘逢禄等有程度不同的研究,而总体面貌模糊不清,可以借鉴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

第二,做区域文化比较研究。这个难点在于如何确定某个区域文化的特点和追究这特点产生的原因。一个地区的文化是多姿多彩的,如何从多姿多彩的表象中找到其中共同的精神、风格、气派,这需要在分析足够的样本的基础上进行抽象概括。尤其是选择扬州和常州这两个相近的区域来比较,这是要探讨“微殊”而不是“迥异”,那就更困难了。

第三,做学术史的比较研究。扬州和常州在嘉道之际在学术史上是很有地位的,尤其是经学和词论方面,所以所谓文化比较其实主要是学术的比较。而一涉及传统学术,因为源远流长,作者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去熟悉它才行,否则就不能下笔叙述,更难发表议论。

不过还好,当博士论文的初稿交上来时,我看已经有了基本的模样,上面的三个问题也都注意到了,虽不能说有多么深入,但作者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叙述、分析的视角了,颇有新意。

从2002年到现在2007年,又经过了五年,再来看这部修订之作,感到徐立望有了长足进步。他对于自己的论题更加熟悉了,所以论述更加从容和自信。论文以实证的方法来探讨嘉道之际扬州、常州的文化,比较其特点异同,从时代背景、地域环境、学术传承等几方面探究其成因,阐述两个地区学人、学派的经世精神,具体论述他们在经古文、经今文、词学等领域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并勾勒出两地文化的总体面貌,论断谨慎,而多有见地。

当然这部著作还是处女作,不成熟之处、可议之处还是有的。那些就留待学术界去批评吧。

在写这篇序的前几天,我刚为徐立望的同学、韩国留学生李春馥的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写了一篇序,在结尾处写了一句希望,它也是我对立望和其他毕业的研究生的希望: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于各位有厚望焉。

北京大学历史系 房德邻

2007年7月2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主要概念的阐述 (1)
- 第二节 选择扬州和常州的时空考虑 (7)
- 第三节 研究成果述评 (9)

第二章 扬州与常州的文人样本选择及其仕途、出身

- 第一节 扬州与常州文人样本的选择 (17)
- 第二节 扬州与常州文人仕途与出身分析 (25)

第三章 扬州地区文化概述

- 第一节 扬州文化特色形成的渊源 (28)
- 第二节 扬州学术谱系的确定及分析 (34)

第四章 常州地区文化概述

- 第一节 常州地区的文化特征 (48)
- 第二节 常州地区的文风 (56)
- 第三节 常州士人的文化成就与产生原因 (59)

第五章 扬州经学的兴盛

- 第一节 焦循:证之以实,运之于虚 (66)

第二节 阮元:推明古训,实事求是	(90)
------------------------	------

第六章 重塑笺注:扬州经学发展之后劲

第一节 刘文淇与《左传》研究	(114)
第二节 刘宝楠与《论语》研究	(134)

第七章 常州公羊学与经世致用

第一节 公羊学复兴起因说	(161)
第二节 艾尔曼研究模式的检讨	(164)
第三节 “自污其学”——庄存与的学术取向	(171)
第四节 庄有可和庄述祖:庄氏之学的分向	(182)
第五节 刘逢禄:保守的经世者	(186)

第八章 经世领域的拓宽

——以张惠言、周济、恽敬为中心

第一节 张惠言:一介儒生	(194)
第二节 周济:词史的提出与晋略的编撰	(212)
第三节 恽敬:文人与循吏	(217)

第九章 常州区域文化的发展及其交流

第一节 李兆洛:通脱之人	(224)
第二节 包世臣:常州“同党”	(236)

附表	(256)
参考文献	(274)
后记	(284)

■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主要概念的阐述

考据学是清代的主导学术,在乾嘉之际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也注意到,乾隆晚期、嘉道之际,经世思潮开始形成。那么在嘉道之际,考据学和经世思潮在空间、时间分布上,两者的关系如何?是并存,还是后者承前者衰落而兴起呢?

嘉道之际常州区域文化十分发达,在古文、词学、公羊学等多个文化领域都有创新,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成为全国文化活动最活跃的地区。而问题是:这一地区各个文化领域之间是独立发展,还是互有关联的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扬州地区作为商业繁荣之所,文化交流频繁,然而文化特征却呈现高度的同一性,崇尚朴实无华之学,以经学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成为乾嘉学术之后劲,体现出经学领域的最高水准。它的文化特征是如何形成,其学术谱系又是如何呈现的呢?

此等种种问题,成为本书写作的动力,在论述展开之前,我们先阐述本书涉及的主要概念。

1. 区域的划分

区域的概念,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说法,是“有内聚力的地区。根据一定标准,区域本身具有同质性,并以同样标准而与相邻

诸地区诸区域相区别。区域是一种学术概念,是通过选择与特定问题相关的特征并排除不相关的特征而划定的”^①。国内学术界对于区域概念的阐述,以人文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为多。参考诸家学说,^②一般认为形成区域有四个标志:(一)空间地域性,各种类型的区域总与一定范围的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二)内部统一性,或是地理或是经济、文化等领域,就某个确定的领域而言,内部具有自身的共同特性。这也是一个区域区别另一个区域的前提所在。(三)特征差异性,只有几个空间存在较明显特征差异的时候,才能产生区域的比较。(四)标准主观性和确定性,这是区域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地方。各学科由于研究的意图不同,造成了区域范围的主观性。可以说,“区域是一个客观上存在的,又是抽象的人们观念上的空间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③。但是一旦确定了标准就不能随意变更,否则区域的比较就毫无意义。

很明显,区域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一方面空间的分布是客观存在的,另一面不同的研究视角会产生不同的区域范围。区域空间的确定来源于研究者的研究需要。

研究区域文化现象,首先就碰到两个问题:区域范围的确定和文化领域的界限。而两个问题又是密不可分的,人类的文化活动需要依存空间才能展开,空间范围又受到文化标准的限制。因此可以说,

①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

② 关于区域的定义,可见[美]埃德加·M·胡佛:《区域经济导论》,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0年;叶依广:《区域经济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张文合、张弘芬:《区域经济》,人民出版社,1994年;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李旭旦编:《人文地理学概说》,科学出版社,1985年;张文奎:《人文地理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金其铭、董新:《人文地理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李德勤:《中国区域文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

③ 郝寿义、安虎森前揭书,第1页。

有什么样的研究目的,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区域范围。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就是区域划分是否恰当。地域划分能否准确地体现研究者的意图,而不是适得其反,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应该提防由于地域划分的不准确,使地区的文化差异性得不到体现。如果研究者提炼出的某个区域的文化特征,在其他地区也是明显存在的,这样就无所谓文化区域的存在。比如程美宝对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的书评中,专门辟出一章以“如何划分地域?为何划分?谁来划分?”为标题,质疑杨念群的儒学三大地域划分的合理性。^①她提出的问题对于区域文化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杨念群划分儒学地域化,在于他意识到自梁启超以至殷海光、庞朴的近代变革模式(即器物层—制度层—思想文化层)的历史解释不合理,认为“三次变革分别由三个不同区域的知识群体所发动,其资源作用的时间性只在单一区域传承的系统内才有意义,一旦被置于其他区域的比较网络之中,其空间的坐标特征就会凸现出来”^②。三大区域相对应于儒学的三种不同特征,就是他做的尝试。

杨氏打破儒学在时空分布上铁板一块的思维模式,采用区域研究取向,无疑是对以往研究的一大突破。但问题在于,他所采用的三大儒学区域能不能真正吻合他提炼出来的儒学特征,这些儒学特征(如湖南注意经世致用,广东强调心智功能的浪漫态度等)多大程度上具有历史的真实性,都是让读者怀疑的地方。程美宝对此有感而发:

史学界对于“区域研究”方法的理解其实很难说有多少共识。目下所见打出“区域研究”的招牌的论著,所划定研

^① 参见程美宝:《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②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3页。

究的“区域”的学理根据本身就颇可质疑……普通的读者也罕有质疑这种以行政区域或习以为常的分类作为所谓的区域研究的基础,但在实证研究中,我们不难觉察这种划分其实是相当主观和随意的。^①

这个问题,周振鹤已较早注意到,他认为由于中国疆域的广阔,不但存在如战国秦、齐之间大范围的文化地域差异,以及省区与省区之间体现出来的明显有别的文化特征,即在同一省区内,也有地域文化的差异存在,对这种差异进行实质性的探索,而不是发表大而化之的议论,是我国文化地理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②

如何寻找最有效的分析单位,以达到研究者的预期目的,这是区域文化研究的迫切问题。我们将在绪论的第二节,结合扬州和常州地区的研究,阐述自己的看法。

2. 经世致用

“经世”并用,被学界普遍认为源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③。成玄英疏:“春秋者,时代也。经者,典诰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志,记也。”^④此处“经世”大意为记录时代,作为先王典诰,流传人世。然“经世”另有一意,为治理世事,秦汉后此意是“经世”的主要解释。如《抱朴子·审举》:“披《洪范》而知箕

^① 程美宝上揭文,第131页。

^② 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绪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页。

^③ 例如王尔敏:《经世思想之义界问题》,(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4年第13期;李甦生:《哲学研究中、日、朝实学比较》,《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李志茗:《清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王先明:《“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等。

^④ 成玄英疏见郭庆藩《庄子集解》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85页。

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①“经世”亦即治世,主要指经邦治国、建功立业,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其价值取向与隐世、遁世相反。经世士人具有用世之心,在传统的社会里,往往表现为入仕意识,而不是纯粹的为学问而探讨学问,其学在实用,排斥空谈心性或纯学术、艺术创作的探讨。

“经世”与“修身”,是儒家基本思想的两个方面,用“内圣外王”可以概括。“经世”凸现的是外王的一面,注重政制,关注社会、国家,与讲求个人修养的“内圣”相对应。根据张灏的研究,“经世”体现在宋明儒学的主流是修身与经世的结合。宋儒重视四书,并以此取代了五经在儒学领域的中心位置,其出发点就是强调修身,由修身而治国平天下,体现为道德理想主义的政治观。宋儒认为“一个政治秩序的建立必须从个人修身开始。一个善良的社会是建筑在善良的个人上面”的。^②程朱谈“理学”,意图在人世间建立道德秩序,陆王谈“心学”,“致良知”,主张知行合一,知识与实践并重。只是宋明诸儒之说的流弊,在多谈义理,对世事已不大关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促使一批士人对于宋明之说尤其是晚明流行一时的阳明学进行反思,而把明朝的灭亡同陆王之学相联系。顾炎武等人提倡考据学风,反对空谈道德性命,力图恢复经书面貌,而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挽救社会危机,以至“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③。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至乾隆时期,考据学日趋发达,士人反对宋儒脱离经传而空谈义理,注重文字训诂和文献考证,虽其中亦有戴震、汪中、章学诚等人的用世之心,然经世未受重

① “经世”作“治理世事”解,及引用《抱朴子》例句,参见《辞源》第3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34页。

② 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并出版,1984年。

③ 潘耒:《日知录》序,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6年。

视,当时的学风以“考证”为主,呈现出为学问而学问的趋向,很少关注现实问题,有悖清初诸儒初衷。^① 乾隆晚期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现,经世思潮开始出现,并形成于嘉道之际。

同为“经世”,但是内容在宋明和清却有异同。两者的相同点在于:都具有入世精神,不同的是:宋明诸儒重视个体的道德修养,阐发义理,把政治视为人格化的扩大,其政治具有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发展到后期,其流弊就是空谈心性,内圣一面高度发达,而外王逐渐淡漠。^② 清儒见宋明之弊端而力挽之,反对空疏之学,而“崇实黜虚”,提倡实学,虽亦不摒弃修身之法,但只限于躬行实践,而不讲学论道。清儒经世主张,更多体现在有用、实用性上,可分两个层面:(一)讲求治法,研究政事如盐业、漕运、河工、赋役、铨选、保甲等;(二)提倡人心风俗,整顿纪纲,维系社会道德秩序。与宋明诸儒不同的是,他们更多注重于义理的实践,而少发挥。清初至道光之际的经世学说,集中体现在魏源、贺长龄于道光六年(1826)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全书分为学术、治体及有关六部各种事务三大部分,主旨是围绕在六部制度的政体结构下要求改革。^③ 近世的经世主张不能全面

① 乾嘉学术之兴起原因,学术界讨论很多,主要从外因和内因两个层面论述,参见《“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一文(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4卷第1期)。

② 南宋亦有陈亮等永嘉学派,讲求功利,但非当时主流。

③ 关于经世的概念、内容的形成与发展,参见张灏前揭文;王尔敏:《经世思想的义界问题》,(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刘广京、周启荣:《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治学”的理论》,(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上册(1986年)。又,大陆学者周好专著《中国近代经世派与经世思潮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认为自己从经世文编入手,首次系统地将近代经世思潮和经世派变迁阐述清楚,并视为自己的创造性科研成果(详见该书前言),实不确。刘广京前揭文对经世文编早就深入研究过,并十分详细。且周好关于经世派变迁的阐述,在陈振江《近代经世思潮的演变》一文中也早有揭示(《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突破传统的政制重围,而只能在枝节上有所增补,在西方入侵之后,传统经世思想逐渐分化,虽亦有维护传统体制之人,但总体已形成向西方学习之趋势。

第二节 选择扬州和常州的时空考虑

我们之所以选择嘉道时期常州和扬州作为研究区域,是出于对区域划分中存在问题的考虑。上文已经提到区域文化中区域范围的划分受到文化概念的限制,而文化概念本身对于学者来说又是见仁见智,大体有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之分。广义指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财富,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是指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与政治和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我们文中取狭义的定义,类同龚书铎所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书中所取的文化内涵,^①并且不包括语言、风俗习惯、宗教领域等文化形态。同时,本文所指的士人,是在当时或以后有一定影响的文化人士,也就是俗称的文化精英,外延上等同于正史列传中“儒林”、“文苑”、“艺术”、“畴人”四类,与功名、官职没有必然联系。

我们研究常州和扬州区域文化,把时间选择在嘉道时期,主要考虑到三方面因素:

(一)史学界对这个时期研究不够,往往只是被学者作为近代开端的时代背景,做大致的描述。但毫无疑问,嘉道时期也是承上启下的时期,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是很缓慢的,更多的还是呈现传统的学术文化脉络,研究嘉道时期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此后中西交融的发展历程。

(二)区域文化的稳定性。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在某个时期表现出较显著的特征,但是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由于跟文化密切相关的

^①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前言,中华书局,1997年。

政治或者经济因素的变动,很自然地影响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比如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江浙文化的影响。这些就提醒我们研究区域时应注意历史的因素,嘉道时期的常州和扬州文化特征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三)有清一代常州和扬州人才辈出,嘉道时期尤其是如此。此时的常州和扬州比较以往历朝,是文化成就最高的时期,与全国此时期文化水准类似的区域相比,更具有创新性,且在经世意识和文化领域趋向性上更一致,更能体现区域性。

理论上,我们不能贸然把文化区域范围的划分等同于行政区域,两者研究的侧重不同,但在具体操作上却常以行政区划界线为界线,正如有人指出:“政区对其辖境内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其中的文化因素趋向一体化,特别是唐宋的州和明清的府,所辖的地域不大不小,对于文化的一体化来说是最适中的。州或府是一群县的有机组合体,州(府)治不但是一州(府)的政治中心,而且一般也是该州(府)的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①清朝大部分时间,常州府管辖八县:武进、阳湖、无锡、金匱、宜兴、荆溪、靖江和江阴。^②府治在武进县,阳湖在雍正二年从武进析出,民国元年两县合并一直到今,两县关系一直十分密切。无论地方志编撰还是历史人物的地域认同,两地都可以看做一处,^③后人往往以历史上的名称“毗陵”统

①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5页。

② 民国后常州行政区域有了较大的变动。如今,常州所属三个市:武进市、金坛市和溧阳市。除了保留原属的武进外,其他两个市从镇江地区划归而来。随着无锡(无锡和金匱已合并)地位的日益增强,已独立而成为地级市,所辖锡山市、宜兴市和江阴市。靖江已划给泰州市。有清一代常州实际上是由现在武进市和无锡市、靖江市组成。行政区域上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常州的注意。

③ 从武进、阳湖分离后的县志编撰,可以看出两县在时人眼中的密切程度。如虞鸣球、董潮同纂《武进县志》和《阳湖县志》(乾隆三十年);黄冕修、李兆洛纂《武进阳湖合志》(道光二十三年);张球修、汤成烈纂《武进阳湖县志》(光绪五年);庄毓铨纂《武阳志余》(光绪十四年)。

称之。^①武进、阳湖两县是常州的文化中心,本文主要以两县人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顾常州其他各县。

区域文化的研究,士人的选定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确定以下界限:(一)本区域大多数士人在某时间段具有类似的风格特征;(二)由风格特征而不是师承关系,或人际交往,或血缘姻亲来规定人员的组成;(三)本区域还有一些士人,并不体现此区域的特征,一般不考虑在内;(四)人选包括受到此区域文化特征影响的其他地方士人。一言以蔽之,本文研究的对象就是具有较紧密联系,治学宗旨、研究范围、学术精神类似的文人区域群体。

第三节 研究成果述评

1. 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特色

毫无疑问,考据学是清代的主导学术。^②研究清代学术流变的

^① 如民国张惟骧所编的《清代毗陵名人小传》,就主收武进、阳湖中人。

^② 对清朝主导学术的名称界定,自清至今名目繁多。如戴震、段玉裁称之“考核学”,孙星衍称之“考据学”(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第八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梁启超定义为“考证学”(梁氏书《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刘师培亦持此看法。《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江藩等称为“汉学”。龚自珍不同意江藩的概括,认为清代有自得之学,“非汉非宋”,实际提出了“清学”名称(《定庵文集》补编卷三《与江子屏笺》,四部丛刊初编本),周予同认可龚自珍的提法(《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7页)。除以上之外,还有“朴学”之称,如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等。目前,学界一般称之为考据学。

各种书籍和文章中,大多数把皖派和吴派作为考据学的两大派别。^①众人分析两派特点主要是遵循章太炎的观点:

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②

梁启超用更平白的话把吴派特点概括成“凡古必真,凡汉皆好”^③,称皖派为“求是”^④。章、梁观点代表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⑤在考据学派分吴、皖几成定论的同时,也有人提出应重视扬州学者。张舜徽最早全面研究扬州学派,他提出扬

① 乾嘉时期学者也曾经对惠栋和戴震的学术做过类似的总结。戴震自称和惠栋的区别为“定宇求古,吾求是”(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一五《古经解诂序》,乾隆三十一年刻本),钱大昕称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钱大昕《潜研室文集》卷三九《戴先生传》,四部丛刊初编本)。《四库全书总目》说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上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中华书局,1995 年,第 242 页)王引之也说惠氏:“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王文简文集》卷四《与焦礼堂书》,民国 24 年高邮王氏遗书本)。但是以上诸家,只是提到了惠、戴两人的学术特点,把乾嘉学术按地域划分成吴、皖两派,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的是章太炎,梁启超亦从此说。

② 章太炎:《检论》卷四《清儒》,《章太炎全集》第 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43 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31 页。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 年,第 27 页。

⑤ 较有影响力的著作如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和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等,就采用此观点。钱穆虽然稍有疑义,说“其时不徒东原极推惠,而为惠学者亦尊戴,吴、皖非分帜也”。但是具体分析时,仍然派分吴、皖,指出:“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韵、名物诸端,其用心常在会通诸经而求其通;吴学则希心复古,以辩后起之伪说,其所治如《周易》,如《尚书》,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吴学进于专家,而徽学达于征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357 页)